



红色记忆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联办
吕梁日报社晚报版部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忆父王献瑞(下)

□ 王士杰

三、汉奸告发

由于根据地军民物资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促使转运站的规模不断扩大,商贩云集于此,远至晋南也有商贩来做买卖,这样就惊动了县城里的日本人,日本宪兵队不断突袭成村。由于情报及时准确,人员和物资提前转移,日本人找不到任何把柄,灰溜溜的走了。不过从此以后,日本特务、汉奸就不断光顾成村,有的鬼头鬼脑捕捉情况,有的到乡公所或店铺要吃要喝,讨要钱财。有个在日本宪兵队宣抚班当汉奸的李扁头,是个大烟鬼,也乘机来敲诈,要村长张文焕给他一百块大洋,村长没有理他,便恼羞成怒的回城里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成村为八路军转运物资的事情,宪兵队派出大批特工、探子,发现了红灯市场有布匹、煤油、军鞋等军需品,和晚上往山上转运物资的秘密。几次偷袭成村,情况十分危急,八路军领导贺志将父亲和张敏曾(已不当村长、专管红灯市场)接到山区抗日根据地躲避起来。

日伪军又一次突然袭击了成村,闯进丰亨店。他们翻箱倒柜,把院里院外翻了个底朝天,最后从门口的一个小库房里,发现了刚从晋南运回来不

及转移的猪毛、猪鬃,当时一般人不知道用途,据说是八路军用它和美国人换武器装备的,在日本人的禁运之列。日本人还搜查了学校,发现学校贮藏着粮食布匹。这次搜查,虽大宗货物已运走或暗藏,但还是被敌人抓住了把柄,抓走了村长和七八个人,也知道了丰亨店在往山上转运物资的秘密。因父亲已躲避在外,没有被抓。敌人回城后,一面检查商号的出入帐,一面派人在出入西山的要道口设下埋伏,封锁进山要道。山上的人有的不知道消息,驮骡一出山口就被敌人捕获,仅李扁头带领的一伙日伪军一次就抓了16具驮骡。这些人大部分是部队上雇的山村老百姓,敌人把他们抓到县城,活埋在原火神庙附近墙根下,解放后拆城墙,挖出了一坑一坑尸骨,死者仅剩骨头,但坑里山区人穿的那种爬山鞋、准备装物资的麻袋却一点也没有损坏。为了严惩汉奸走狗李扁头,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358旅的八路军徐矮子在区基干队的配合下,摸进东关李扁头的家,除灭了民族的败类,这也是对汉奸特务的一次严正警告。

四、父亲被捕

形势越来越严峻,斗争十分残酷,城里的内线有的也被敌人破坏了,成村布满了敌人的密探。几个月后,在山上父亲因惦念着家里的老小,便和张敏曾一起返回了成村,由于事态紧张,张敏曾只身离开成村到了武汉,我父亲则隐蔽在家,但转运工作没有停止,所有物资都不能再堆放院内,而是转移到了村西三千亩的芦苇地,夜深人静时,再悄悄地运往山里。虽然转运工作十分隐蔽,仍没有躲过敌人的密探。

1940年的夏天,村里来了一个清徐人,自称是太原日军特务,专门派来调查丰亨店给八路军转运物资一事。村里梁席通等人想利用汉奸爱钱如命,吸大烟的特点来瓦解和收买此人,便介绍他与我父亲见面了,还送了此人不少烟土和银元,他走时对父亲说:咱们交个朋友吧,我不会害你,我说你没事就没事。父亲也就放松了警惕。农历十月初三清晨,一车从太原来的日军突然进村包围了我家,院子里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五花大绑地抓走了我的父亲。家人急得不知所措,乱成一团。事情发生后,八路军抗日政府积极组织营救,让家里人出面活动。我大哥和本家叔叔王五瑞带上大量银元和烟土到太原活动,经过许多周折,最后通过本县梁家庄孙

云泰当日本翻译的女婿,才打听到父亲关押在日本特务队监狱里。父亲经历严刑拷打,但一直一口咬定自己开店是赚钱养家糊口,接纳客人不问人家干什么。父亲被乱棍打得晕死过去再用冷水泼醒,直到被打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花了许多白洋和大烟土疏通,并找到担保人,才将父亲保释出来。当时给父亲包裹了棉被放在马车上,因为不能经受路上的颠簸,太原到交城一百里路就走了一天一夜。到家后,父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能清醒一小会。出狱的第四天,父亲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临终时母亲和几个儿女都在场,我只听到父亲说了一句话: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父亲去世后,抗日政府和军队都派人来家中慰问。

尽管如此,日本人也没有放松对丰亨店的监视,他们还经常到成村来搜查,每次来村里搜查都要进丰亨店,进门后更是横行霸道,稍不如意就拿枪打人,我大哥就是被日本人用枪托重重的砸在后背上,疼痛难忍,乡里医生说他背后有一个要命的穴位,可能是打在那个穴位上了,没过几天大哥就离开了人世。从此转运站工作结束了,丰亨店也没有再开张,经营了百年的祖传老店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五、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那时我在交城上学,听到消息当日就赶回家告诉全家,家人都悲喜交加,彻夜难眠,父亲希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但回城上学后,发现阎锡山没来一兵一卒解除日本武装,而是把日军集中在大操场的会议室“供养”起来了,日伪的汉奸县长郝步庭成了阎锡山的县长,日伪的警备大队变成了“交城爱乡团”,大队长郭省三升任爱乡团的上校团长,日伪的“新民会”变成了阎锡山的“同志会”……我们好多同学都想不通。我家大嫂更是气愤,就到处打听共产党的人,想了解一下情况。后经梁联伟的父亲引见,见到了梁联伟和任井夫。以后,我大嫂为他们往来情报做了许多工作。阎锡山搞“三自传训”时,我大嫂和侄女被抓到了特务组监狱。我在交城中学“自白转生”时也遭严刑拷打,无奈逃到了榆次。

交城县成村红色物资转运工作和红灯市场大概存在了三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按重量来粗略计算,以我家丰亨店为例,每天接待一百多匹驮运骡马,一般一个驮骡平均每次运货一百公斤,一百个驮骡的运力就是一万公斤(十吨),一个月丰亨店就要运走三百吨货物。除去天气极差时,农历过年,敌人捣乱时

不能正常工作,大概有25个月至28个月是正常运行,这样下来就是7500吨至8500吨。另外零散装运可估计为3000吨左右,这样算下来,三个年头,共运送货物一万余吨。这些物资是在日军封锁我晋绥根据地,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是在距敌人占据的县城仅5华里的交城成村完成的。这是交城人民凭着高尚爱国心同日寇做的顽强斗争,是交城人民用生命和血汗为抗日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转运工作虽然因形势的变化停止了,但交城的优秀儿女为抗击日寇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交城这块热土上,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激励着人们更加努力的为祖国的明天不懈奋斗。

难忘的回忆

追忆梁树棠同志

□ 魏进德

梁树棠同志于1941年8月至1942年8月在晋绥的兴县任县委书记,当时我是县委组织部长。我与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虽仅一年,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为革命事业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的形象仍历历在目,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仅就一些回忆片段,将他的事迹记述如下:

一、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用“蚕食”政策,频繁的武力“扫荡”,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革命根据地;国民的反对派也企图用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的阴谋手段置我抗日军民于死地。兴县是晋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敌人每次进攻的中心地区。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梁树棠同志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大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1941年冬季日寇残酷扫荡,他动员全县人们进行反“扫荡”,坚壁清野,把粮食和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掩埋起来,县级机关把文件

转移到偏僻山庄,抵制了敌人的“三光”政策。每次扫荡时,敌人直扑县城,他不顾个人安危,叫机关干部先转移,自己总是最后才走,干部群众对他非常感激。他经常向群众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浅出,很受欢迎。1941年和1942年,兴县群众为了支援抗战,踊跃交公粮、送草料。妇女做军鞋,完成得又早、质量又好;青年男子争先恐后报名参军,涌现出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参军的感人事例。

为了动员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新政策“三三制”政策,即政权组织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特别是在村选中,他掌握的很好,亲自找党外人士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群众反映很好。如民主人士孙良辰说:“共产党真是为人民的”。

二、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干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的好。决定重大问题,从不个人专断,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党的指示总是召集大家学习讨论,然后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县委会每次开会吸收有关人士参加,如讨论政府工作,吸收县长与科长参加;讨论群众工作,吸收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让大家充分提出意见展开讨论。每次会议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县委讨论干部的工作调动时,他总是说:“你先征求一下本人意见。”1942年从分局分配来一个华侨,名叫史波,才十四、五岁,对本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懂,梁树棠同志专门嘱托说,先将他放在县青救会工作一段让他熟悉之后再下基层。他总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因此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

三、生活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与群众同甘苦。晋西北高原的严冬是很冷的,他只穿一件多年的破棉衣,只有一床薄被和一条旧棉裤子。他吃饭和大家一样,县委厨房做什么吃什么。在战争年代,一天三餐都是粗粮,难得见一些肉和细粮。每天早上小米稀饭、窝头;中午豆面或莜面;晚上小米、黄米干饭或拌汤。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常因工作忙到很晚才去餐厅吃饭。晚上,他经常是彻夜读书或写材料。我那时住在他的对门,发现他深夜还在工作,便过去劝他早些睡,他总是说:“你先睡吧!我还不睡。”他把党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忘我的工作着,干部们对他的崇高品质深深感动。

四、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党的建设非常关心,他严格要求自己,党性纪律很强,每次开党的生活会必定参加,而且主动检查自己,并对同志们的缺点及时指出,帮助改正。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得到同志们的称赞。他多次向我说过,要注意在贫雇农中吸收党员。1942年在全县整顿党支部工作时,他强调要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要重视思想上的整顿,要发挥党支部在抗战中的作用。所以,兴县的建党工作做得比较好,受到上级的表扬。

以上,不能表达亡友功绩之万一,仅凭记忆,叙述点滴。

(1990年12月15日)